

Masters of Peking University

孙 轶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先生们/孙轶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ISBN 7-300-04901-X/K·262

I .北…

II .孙…

III .北京大学 - 学者 - 生平事迹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0546 号



北大先生们

孙轶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总编室) 010 - 62511239(出版部)

010 - 62515351(邮购部) 010 - 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5 × 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9.5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74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北大作为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人们的心里有一种神奇的魅力。这种几乎无法言传的精神吸引力来自北大的方方面面，但最重要和最本质的还是她异彩纷呈的学术思想和精神。

北大无论被人赋予了什么样的神秘色彩，她本质上始终是一个学术摇篮，而她的终极价值也在于她对真理的追求和贡献。

自近代以来，北大培养和吸纳了一大批中国的思想巨人和学术精英，星汉灿烂，既是北大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国的骄傲。曾经的学术大师们的思想至今还启迪着人们，他们的治学态度、高尚人格和奇闻逸事也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成为北大上空飘荡着的精魂。

北大的学术传统是代代传承的。民主自由、兼容并包、思想活跃、视野广阔和历史责任感，造就了北大良好的学术氛围。这样的氛围培养、造就和吸引了当今中国最优秀的学术工作者。他们在燕园里思考、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成果教授给年轻一代。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对中国的学术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大向来被认为是引领着中国思想的潮流，是走在时代最前端的。北大的学术工作者们也确实富有学术的勇敢精神，敢于怀疑和挑战，这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思想与与众不同的观点以及有趣别致的学术体系的原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又是相当缜密和严谨的。他们厚积而薄发，十年磨一剑，有着相当艰苦的积累过程，这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任何一个时代，把追求学术作为终身职业的只能是少数人。这既需要天赋，也需要勇气，还需要契机。然而正是这少数人，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理性精神，也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智慧进程。他们是可敬的，是幸运的，而且也是重要的。了解他们，其实就是在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思考状况，了解中国人如今最高的智慧水平，也是在深层次地了解我们这个

时代本身。

如何才能真正地了解生活在北大的学者们？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想？而我们又能够在他们思想的启发下如何去思考种种的问题？

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些学者们的思想艰深难懂，对于他们的专著也会望而却步。的确，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出于方便或习惯而使用一套特定的语汇，这样的语汇使我们觉得接近他们的思想是如此困难。但其实，一位杰出的学者和他们各自的学科一样，最本质和精髓的思想通常可以用很短的篇幅简单通俗地概括，艰深晦涩的只是一般人所不必要看懂的求证过程。因此，我们能够用便捷的方法去认识他们和体会他们的思想。

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会感到幸福。尽管我们并不是学者，也许将来也成为不了学者，但我们追求精神充实和思想更新的欲望却总是常在的。

编写这一册《北大先生们》，就是为了让中国爱思考的人们有一个亲密接触那些北大学者们的机会，有一个站在智者的肩上看世界的机会，有一个体验与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者进行心灵交流的幸福的机会。

本书介绍了北大的 18 位著名学者。除了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核心思想和主要成果之外，本书还注重描述了他们在学术道路上的坎坷经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他们高尚的人格、丰富的情感。

当然，德才双馨或年高德劭的北大先生们远远不是这本小书所能含括的，我们将以“北大先生们”这个主题，继续关注北大的历史和文化生态。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于这些杰出的学者们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我们受益的不仅仅是理性的思想，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人格的净化和人生的感悟。

目 录

前言	(1)
中国东方学的泰斗:季羨林	(1)
乡村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费孝通	(20)
中国哲学史泰斗:张岱年	(36)
杰出的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	(52)
中国文化的传承者:汤一介	(71)
中国新时期的“毕昇”:王选	(88)
中国“股份”第一人:厉以宁	(110)
燕园中尽情翱翔的青鸟:杨芙清	(128)
中国经济预测大师:萧灼基	(143)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乐黛云	(153)
新文明时代“之父”:叶文虎	(167)
独立人格的文史家:陈平原	(186)
经济学家中的“自由主义”者:汪丁丁	(199)
智慧之光的追逐者:何怀宏	(219)
中国经济学界的奇才:张维迎	(234)
林中路上的思想者:陈嘉映	(252)
大众文化殿堂的漫步者:戴锦华	(267)
后现代文化的探索者:王岳川	(284)

中国东方学的泰斗:季羨林

季羨林,1911年生,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学术著作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罗摩衍那初探》、《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季羨林论印度文化》、《季羨林佛教学术论文集》;译著有:《论印度》、《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羨林散文集》、《赋得永恒的悔》、《怀旧集》、《人生絮语》、《牛棚杂忆》、《留德十年》等;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

童年:母亲的影子

1911年8月6日,季羨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兵荒马乱的年月,出生于一派凋敝的中国北方贫穷乡村的这个新生儿,却以异常安静的姿态面对眼前这个纷乱的世界。他似乎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外部世界的内敛和包容。长辈们为此欣慰地舒了一口气,衷心地祈望他平安长大,安稳地度过一生。

没有人可以预见,这个超乎寻常地安静、乖巧的孩子,在此后的岁月里,将会给20世纪的中国文化带来多大的辉煌。

出身于贫穷的农家,季羨林的童年也毫无例外地被穷困和饥饿的阴影所笼罩。父亲曾在济南打工谋生,最后仍被迫回到家乡。季羨林出生时,家里只有半亩地,即使加上在济南谋生的叔叔的间或接济,一家人仍难以温饱,只能以高粱面饼度日,而且还吃不饱。一口白面馍馍的甘甜,就成了季羨林童年最大的奢望。

母亲的印象便是和饥饿交织在一起的,母亲每天的辛苦劳作,似乎都是为了吃饭。艰难的岁月已经模糊了母亲的容貌,在与母亲相处的六年时光里,留在季羨林脑海中零碎浅淡的关于母亲的记忆,几乎都与吃有关,那是在饥饿和贫困中的挣扎。

季羨林的母亲出身于和父亲一样贫穷的农家,作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妇女,时间已经悄悄湮灭了她存在过的几乎所有的痕迹。终其一生,她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而她一生跨越过的最远的距离,也就是从娘家到婆家的五里路。

然而,就是从这样一位普通的女性身上,却体现出了中国母亲最伟大最深挚的爱。在季羨林的记忆里,母亲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劳作。而季羨林从小就是一个极为温顺、听话的孩子,从来没有让人操过心。四五岁时,季羨林就开始和本村的大人一起到富户人家的地里捡人家收割后剩下的麦穗。经过一个麦季的风吹日晒,他捡的麦子居然也打出了十来斤麦粒。母亲十分高兴,为了表示对他的鼓励,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给季羨林解馋。但也只能是解馋而已,不到十斤的白面,哪里能够痛痛快

快地饱餐呢？但再懂事的孩子也只是孩子，有一次季羨林再也忍不住馋劲了，就多吃了一块白面馍馍，竟惹得母亲追着要打。季羨林灵机一动跳进水坑，母亲却怕湿了衣服而只好作罢。他便站在水坑里尽情享受了白面馍馍的甘甜。

这是季羨林童年记忆中惟一的一次“挨打”。他一向温顺听话，得到大人们普遍的喜爱。母亲更是欣慰欢喜，从来没有动过他一根手指头。但这种偶尔的淘气，却显现了季羨林那温和平静的性格之内蕴藏的灵慧光芒。

其实，母亲的追打，只是为了让他能够细水长流地享用那少得可怜的白面，而母亲自己却连丝毫都没有沾过嘴唇。她把能得到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好东西，全部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而她自己用来果腹的，除了一点点高粱面饼子外，便只有田里的野菜了。

以上这些，已经是季羨林对于母亲几乎全部的记忆了。六年在故乡和母亲的共同生活，经过岁月的磨蚀，只留下了这可怜的痕迹，剩下的就是永远的怀念和无尽的悔恨了。

六岁那年春节前夕，季羨林离开了官庄，离开了母亲，随叔父到济南上学。由于家里太穷，而他又是父亲兄弟惟一的男孩，肩负着光耀门楣的使命。这个六岁的孩子，虽然平常不爱说话，但感情深沉。性格内向的小羨林对爱他如命的母亲有着多么深的依恋和不舍。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等有了出息就将母亲接来一起过好日子。

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分手便成了永远的诀别。他在北平读大学期间，惊闻母亲去世的噩耗，等他赶回家乡也只是见到了一副薄薄的棺木。十几年的生离至此成了天人永隔的死别，他心中的悔恨和内疚难以言表。他无法想像母亲内心无尽的悲伤和思念，只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而很早母亲就不在身边的经历，对季羨林的性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自立自强，克己慎独的良好品德与长期寄居在叔叔家有关，一向内向、不事张扬的他，也由此变得更加内敛沉稳。

济南：最初的启蒙

1917年的济南，是一个灰蒙蒙的略显衰落的古城，但作为大省山东的

省城,它仍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尤其是对于生长在偏僻乡村的季羨林来说。来到济南实际上是开辟了他人生中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

最初,叔父将季羨林送到一所私塾读书,不久便让他进入了新式的小学。这所小学很大,非常正规。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高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性格安静、本分的季羨林很好地达到了这四个字的要求,成为一个既听话又上进的好学生,而且成绩也一直不错,但他并没有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那些枯燥刻板的背诵上来争取最好的名次。童年时期应有的好奇、好胜与顽皮让这个聪明警觉的孩子把注意力放到了更多的地方。

最让季羨林痴迷的就是读闲书。他最喜欢那些侠义公案小说,像《彭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常在家里偷着看,一般是桌上放着课本,桌下塞着闲书,如果叔叔进来察看,他便敏捷地将闲书往脚下的缸里一丢,大声读起课文来。到了学校,那就更放心了,只要一放学,季羨林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埋入书里的世界。无论是在学校的假山背后,还是在哪个工地上,只要拿出闲书,便如饥似渴地看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他沉迷在故事里,神往着口吐白光杀人无形的剑仙和侠客。正是从这些闲书开始,季羨林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惯,也和文字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同样在小学期间,季羨林由于一个偶然的機會,开始了外语学习的生涯。有一位教员稍通一些英文,这在当时封闭落后的济南城已十分难得。他开了一个私下的业余英语班,季羨林跟着这位老师学了26个字母和少量单词。虽然只有这一点点,但却使季羨林发现了外语这个全新的奇妙世界,同时也初步显现出他在外语方面超人的天赋。这段经历,也就是日后这位精通古奥晦涩的梵语、巴利语和陀语等古文字的学界泰斗最初的学术渊源。

13岁那年,季羨林考入济南的正谊中学。学校坐落于大明湖畔,湖光水色,柳韵荷风,正是泉城济南风景最佳之处。在这里的学习,季羨林仍保持了他悠然自在,温和不争的风格。他的成绩处于中上游,课余读书游玩。但叔父对于这个季家惟一的男孩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不断亲自对他进行教育,并选出一本《课侄选文》的古文集让季羨林读,更不惜花费将季羨林送入许多课外补习班,有专读古文的学习班,背诵学习《左传》、《战国策》之类的经典古文,还有晚饭后尚实英文学社的英文补习,其中也有大

量的背诵和习作。这样一来，季羨林课内课外的学习任务就显得极为繁重。但他没有任何的厌学情绪，从不视学习为负担，只要读书，就全心全意，力求读好。而正是这些看似枯燥的学习，为他日后的深造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初中毕业，季羨林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之后，便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读书。在这里，他遇到了教国文的王昆玉先生。这位先生对季羨林的影响很大，不仅因为他本人学问渊博，才华过人，还因为他对季羨林格外赏识。季羨林在他的国文课上的第一篇作文是《读〈徐文长传〉后》，没想到这样一篇与往常一样应付了事的作业，却得到了王昆玉先生的高度赞赏。他的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这对季羨林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他不仅从此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的学习态度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不再只是顺从地完成学校和叔父安排的那些学习内容，而是自动地找来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唐宋名家的文集，认真钻研起来。同时，学外语的劲头也更加高涨，在英语课外，他又加学了德语。季羨林变了，他对学习不再采取随遇而安的无为态度，而是有目标地去争取提高自己。

原本就聪慧过人，再加上这样的努力，季羨林的学业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他在第一学期就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也就是全年级第一。对于血气方刚的少年来说，做了第一就不能再做第二。更何况他还由于成绩突出受到了校长的亲自嘉奖。在有意识的努力下，季羨林在三年的高中学习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创造了“六连冠”的奇迹。在此他显示出了性格中一下决心就坚持不懈的特点，这也是他日后获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此，渴求知识，努力学习成为季羨林一生的追求。而这个巨大转变的发生，主要的源起就是王昆玉先生的那次批语。由此可见，老师的一次称赞，往往会成为改变一个学生一生的契机。

1928年，由于日军侵入济南，季羨林辍学了一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发表于天津《益世报》，笔名希逋。他的文学才华得到进一步的展现。

1929年，季羨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在这里，他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这对他的一生都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国文方面。

首先是胡也频老师,他把季羨林带入了现代文艺的全新天地。他不讲丝毫的古文,而是每次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然后旁征博引,眉飞色舞。在他的影响下,季羨林和别的同学一起读了许多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虽然还似懂非懂,但不啻是为他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视野。

在胡也频因躲避国民党追捕回到上海后,接手季羨林国文课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的授课方法十分特别,让学生写作文的题目永远是四个字:随便写来。这种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条条框框拘束的教学方法使季羨林受益匪浅。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淡泊处世,自往自来,与世无争,心无拘碍。董先生的这种要求与他的天性天然契合。他充分利用了董先生给的这个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随便写来,反而写出了自己特有的散文风格。董秋芳先生也对季羨林的写作大为赞赏,认为他和同学王联榜是“全校之冠”。他和季羨林形成了一种精神上心照不宣的默契,他对季羨林的影响也是在内心深处的。以后的七十多年中,季羨林所研究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写作遥不相及,但随时随地,只要感情上一有所动,心血来潮,他便“随便写来”。这随便写来的文章,却总是洋溢着学者的智慧和诗人的情怀。如果说季羨林在身为东方学泰斗的同时也称得上是散文大家的话,这与当初董先生的认同和培养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同时也来自于他从小学起就结下的文字情缘。

清华:殿堂的大门

1930年,季羨林高中毕业了,与班里的同学一起来北京考大学。在报考的时候,他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报考七八所大学,而是只报了清华和北大。别人替他担心,他只是微微一笑,并不多言。这个时候的季羨林,不经意地显露了他那种埋藏于内心深处的骄傲与自信。高中“六连冠”的辉煌,使他对自已的学业没有丝毫的怀疑。

果不其然,季羨林同中北大、清华两榜。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清华由于庚款建校的背景,出国的机会较多,而他是希望将来能到国外去留学的。于是,19岁的季羨林最终走进了清华园。

季羨林选择了西洋文学专业，这无疑是他自幼的外语兴趣在起作用。这时他的英文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入大学的同一年还连续在天津《益世报》等报章上发表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等多篇译作。而清华园的教授中有许多是外籍人士，无论来自何方，他们上课都用英语，就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要讲英语。西洋文学系的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在这样的环境里，季羨林的感觉自然是如鱼得水，学起专业课来一点也不费力。

季羨林进入清华的时代，正是民国时期学术繁荣的顶峰，清华园中云集着无数名声显赫的教授大家，他们开设了各种丰富的课程，这使季羨林有如进入琼林仙境，面对七宝楼台的感觉。他拼命地选课，到处旁听，领略了许多名流学者的风采。虽然他的专业是西洋文学，但出于对中国文学始终不渝的爱好，季羨林旁听了朱自清、郑振铎、俞平伯等许多著名教授的课程，并和他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在这些旁听课程中，对季羨林影响最大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为了买到参考用书《六祖坛经》，季羨林还专门跑到城里的一个大庙去。陈先生讲课与文学教授大不相同，并不随意挥洒，而是严谨论证。他总是像写文章一样，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和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缜密细致，如剥茧抽丝，没有丝毫的纰漏。季羨林对此极为敬佩，把听陈先生的课当作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而陈先生这种丝丝入扣的做学问的方式，正好与季羨林严谨、缜密的思维方式完全合拍，他几乎在那时就确立了以后的治学风格，认为如果做学问，就应当像陈先生那样一丝不苟。可以说，陈寅恪先生的治学风格几乎影响了季羨林整个学术生涯。除了学术，在为人方面，陈先生的清雅散淡、朴实无华也给季羨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让他懂得了在毫无修饰中却反而能最好地体现出大学者自然随意，返璞归真的名士风范。

在广泛听课的同时，季羨林也开始在课余写一些散文，并拿给经常与自己在一起纵情谈论的同学们看。当时清华的教授中有一位一点架子也没有的，这就是西谛（郑振铎）先生。他性格坦率随和，经常与一帮文学青年交谈争论，季羨林也是其中的一员。西谛先生当时与巴金、靳以一起办了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他很乐于把这些后生小子吸收进来。

当季羨林看到自己的名字作为编辑也上了杂志的封面,他心中对文学的喜爱不自觉地又深厚了一层。在此期间,季羨林有多篇散文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特别是其中的一篇《年》,更是得到了清华教授们普遍的赏识。

快乐的时光总是易逝,在清华学习的四年很快就过去了。面临毕业,季羨林不禁感到迷惘万分。一方面是他的专业,尽管他轻松地完成了西洋文学系的各门课程,也阅读了大量原著,但总感觉浮光掠影,难以深入。相反,一些选修或旁听的课程,如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等却令他印象极为深刻。另一方面,就是就业问题,既无背景找到一个丰足稳定的职业,心中向往的留学道路又由于官费名额有限而困难重重。四年的大学生活虽使季羨林满腹经纶,博古通今,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却一筹莫展。幸好此时母校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他回母校任国文教员,这对季羨林来说恰似绝处逢生。

在母校的教师生活虽然平静安逸,但年轻的季羨林却总难有内心深处的满足感,他的志向是远大的,他一直期望着远渡重洋,到当时全世界知识最丰富的那些殿堂里去领略一番。就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DA)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自出,食宿费相互给予”。条件虽不丰厚,但对季羨林来说却是天赐良机,他马上报了名,由于他主修的是德文,而且成绩优异,自然很容易就通过了。

于是,1935年8月,季羨林踏上了前往德意志的道路,圆了渴望已久的留学梦,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渺不可知的生命旅程。

德国:漫漫十年路

最初到达德国,季羨林的生活有一点儿狼狈。首先是生活不好适应,德国人居然吃生猪肉!还有就是住处难找,费了千辛万苦才总算找到。而最大的问题在于语言,因为季羨林虽然在大学里主修了四年的德语,却基本上是只能看不能说的“哑巴”!要留学,听不懂说不出话怎么能行呢?

在德国友人的热情帮助下,季羨林被安排在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里学习。为了尽快突破语言障碍,季羨林发扬了他一贯的刻苦和坚

忍的学习精神，每天和清华老学长乔冠华一起上课，勤学苦练，互相督促。他超常的语言天赋使他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他们两人的学习精神与许多来德国玩乐，不务正业的留学生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熟练掌握语言后，在德国学术交换处的安排下，季羨林来到了哥廷根大学。

哥廷根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仅学生就占了人口的 1/5。这里风景秀丽，环境清幽，几百年的历史使哥廷根大学在德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城里许多街道的名字都是一些曾震撼了历史的姓氏。小城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学术气息，就像一个学术乐园，一片文化净土。

而初到此地的季羨林，在充盈的喜悦里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迷茫。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看到了未来的道路，却又说不清这道路具体是什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梦想，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这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正是这个梦想，把季羨林引向了他将为之努力一生的曲折而光辉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学习梵文，是他在德国找到的，也正是从哥廷根开始的。

在哥廷根的学习伊始，季羨林仍然有些摸不到头绪。第一学期，他听从朋友章用——章士钊先生的公子——的建议，选择希腊文为主要课程，其他又选了许多课。这时他学习古代文字的想法才初具雏形，再加上德国大学教育制度无与伦比的自由和开放性，确实令他有不知所从的感觉。这一时期，是季羨林在留学期间最困难的时期。他有了朦胧的方向，却无法最后找到自己的道路，迷惑、困扰、急于投石问路等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他感觉到无比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学了一段时间的拉丁文，并且还产生了学古埃及文的想法，真有些四面出击，手足无措。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实在想学到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在国外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终于，在一个偶然又注定的因素下，季羨林确定了学习梵文的决心。一位学过梵文的同学将自己用的语法书送给季羨林，于是季羨林对章用谈起自己学习梵语的想法，得到他的极力支持。季羨林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极大，有必要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于是经过长时间痛苦的

彷徨和犹豫,季羨林的信念最终坚定下来,选择了梵文作为自己的方向。而正由于选择过程的漫长和艰难,使得季羨林在对待这个最后之选的课程,带上了最深的虔诚,倾注了最大的精力,以至于耗费了毕生的心血。

哥廷根是一个学习梵文的绝佳地点;且不说这里的环境典雅幽静,可以专注精力,哥廷根大学本身就有悠久的历史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一大批梵文和古印度学界的泰斗人物都曾在这里任过教,如《五卷书》的研究大家、比较文学史学的创建者本发伊,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尔纳格尔等。再加上这里的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极丰,尤其是精藏了大量珍贵的梵文古籍。这样学习梵文的条件,的确是无与伦比的。

季羨林对于这一切无疑都是极为珍惜的。1936年春季学期,他选择梵文作为主课,到哥廷根大学东方研究所去上课,他的第一位梵文老师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尽管十分年轻,却已是新疆梵文佛经残卷的著名研究专家。季羨林是梵语课惟一的一名学生,足见梵文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度。但教授仍然极为认真地上课,并给季羨林提供了大量的学习和参考资料,给他介绍德国梵学界众星云集的盛况。另外一方面,季羨林也极为用心地学习着。他每天都早早地来到东方研究所,上课,看书,中午也不回去,更加谈不上睡午觉了。他的生活变得十分有规律。除了周末和几个中国朋友在一起郊游聊天外,他总是把自己一整天都埋在古文字堆里。这种略显单调和辛劳的学习生活却使他感到无比的轻松和充实,他认为这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从中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巨大享受和陶冶。

本来,按照他所签订的学生交换合同,季羨林在德国的学习只有两年时间,但他仍旧做好了参加博士考试的准备。德国的惯例是,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一主两副。季羨林就选了印度学为主系,经过再三考虑,又选了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他已下定了决心要学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

但是,1937年到了,季羨林的交换期满,这时国内抗日战争也已爆发,山东被日军侵占,季羨林的归路也被切断了。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哈隆教授主动找到季羨林,请他留下做汉文讲师,季羨林喜出望外,于是交换期满之后季羨林便成为了汉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在汉学研究所工作的日子里,季羨林与哈隆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汉学家,从他们身上受到不少治学之道的启发。

但更重要的是，他要以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身份上课、学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段欧洲最为风雨飘摇、令人窒息的日子里，季羨林在风暴中心的德国竭尽全力地坚持着自己的学业。他的三个选系的学习都很顺利。第五学期进入讨论班，第六学期开始讨论博士论文，最后定为研究《大事》偈颂部分的动词变化，即《〈大事〉偈颂中的限定动词的变位》。他的论文导师，先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后来是西克教授，两位老师都极为尽责。后者更是把自己毕生的学术专长都向季羨林倾囊传授：包括《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疏》、《十王子传》，还有吐火罗文。季羨林幸运地遇到了这些严谨而无私的名师，他的收获是可以想见的。

但德国教授的治学也是世界出了名的严格，要想写出一篇令他们满意的博士论文，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季羨林写论文的过程，也是毫无例外地倍加艰苦。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计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再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先写出提纲，最后再写成论文。

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还有一段比较有趣的小插曲。季羨林自幼喜爱文学，写出的文章也总是文采飞扬，他于是也想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那些干巴晦涩的论述加入一些自己的描述，便精心写了一篇典雅工致的导言。谁知这篇导言却被教授全部划掉。这对于季羨林可以说是当头棒喝，不过也让他明白了做学问必须扎扎实实，来不得半点虚伪的道理，因而受益极深。

1940年12月23日，季羨林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经过精心的准备，他的博士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并受到教授们一致的高度赞扬，认为他的某些论断对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这令季羨林十分欣喜。最终，季羨林以论文、印度学、斯拉夫语言和英文考试四个全“优”的成绩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多年的夙愿和梦想终于实现，也可以给母亲的在天之灵一个巨大的安慰。这个时候，季羨林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到自己阔别多年，魂牵梦萦的祖国。

但归国之路已经被阻断了。就在季羨林埋头于梵文研究的时候，世界已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欧亚两大战场的战争早已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各种归国渠道都已经断绝。他曾尝试过通过瑞士回国，却发现首先连瑞士都去不了。极度沮丧之下，季羨林只有选择留下，继续在哥廷根大